

明末清初  
文人结社研究续编

何宗美 著



中华书局

# 明末清初文人结社 研究续编

何宗美 著

中华书局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续编/何宗美著. - 北京:中华书局,2006

ISBN 7 - 101 - 05406 - 4

I . 明… II . 何… III . 知识分子 - 研究 - 中国 -  
明清时代 IV . D69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44196 号

---

书 名 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续编  
著 者 何宗美  
责任编辑 赵 伏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06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1 1/4 插页 2 字数 300 千字  
印 数 1 - 25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7 - 101 - 05406 - 4 / K · 2425  
定 价 26.00 元

---

## 作者简介

何宗美（1963—），湖南省永兴县人。2002年7月毕业于南开大学文学院，获博士学位。现为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中文系主任。著有《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公安派结社考论》《古代文学散论》等，获得2004年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论文、2004年天津市优秀博士学位论文、重庆市第四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第四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等多项学术成果奖。

责任编辑——赵 伏  
封面设计——王铭基

## 城头不变“拙者”旗

——序宗美《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续编》

日前，有在学界享大名的朋友传授其“作科研”的不传之秘，曰“炒概念，树旗帜，占山头”。据说，经过这一过程，而又捷足先登者，什么“项目”“经费”“奖项”之类，皆“欲拒之而不可得也”。

听罢，愕然。

我没有进行规范的调查，不知道这种成功模式的“普及”程度。抑或只是酒后的几句玩笑话吧，我希望是如此。

不过，印证近年来陆续曝光的一些前科技明星，其欺世盗名的招数又确乎如此。联想起学风问题之为热门话题而持久高温难退，杞人之忧倒真的是“欲拒之而不可得也”。

城头变幻大王旗，学术若真的到了这种地步，民族文化的复兴就只能是海市蜃楼了。

幸而并非如此。鲁迅先生讲过：“中国自古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他们是中国的脊梁！”当前的学术界，之所以还没有充满变幻不定的大王旗，就是因为还有一大批同仁在“埋头苦干”，在“拼命硬干”。学术的使命、学者的良知，使他们足以抵挡把“大王”们拖下水的诱惑，使得中国学术界还有挺立的脊梁。

读到宗美的《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续编》，我更加坚信了自己的这一判断。

大约在十年前，宗美和我谈到这个选题的时候，我曾给他泼过两瓢冷水：一瓢是“这个领域已有谢国桢先生的大作，虽未臻完备但也超越不易，恐须付出双倍的努力”；一瓢是“这个角度

不是当下学界关注的热点，要有坐一段冷板凳的思想准备”。这两瓢冷水不仅没有浇灭宗美的学术热情，反而激起了他加倍的精进之意。这一进就是十年。十年的时光，青灯黄卷，中间经历了种种学术方面的与非学术方面的变故，而不变的是宗美对学术的执著。于是，新的材料不断发现，新的见解不断提出，新的问题不断揭示，已出版的《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以及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一《续编》不过是这十年心血结晶的一部分。

关于文人结社问题的学术意义，宗美书中已经谈了不少，诚为不刊之论。余英时先生曾有《士与中国文化》一书，视野相当开阔，但这样一个题目缺略了明及清初的文人结社，总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遗憾。因为在研究中国知识分子（广义的）特质的时候，作为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他们自我组织的情况，包括组织形态、组织功能，与政府的关系，与宗法家族的关系，与自身生存状态的关系，与士林价值取向的关系，与社会文化潮流的关系，等等，实在是不可或缺的部分。而这样一个大题目，又和文学史、政治史、社会生活史、思想史等领域的研究密切相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上述领域深化研究的必要基石之一。

宗美的十年辛苦，在这块土地上结出了丰硕的果实。特别是在挖掘材料，爬梳分析方面，很多工作都是开拓性的。这是需要大量而持续的“笨功夫”的，巧者恐不肯为之。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巧者的变幻不定的旗帜飘散了无数，而拙者的学术“认军旗”虽无意树立却自然树起。这个领域接下去的工作也许更加艰辛，相信宗美不改其“笨”，不改其“拙”，不改其乐。

如果若干年后，宗美又有新作要我作序，我仍然是会欣然从命的。

陈洪于溽暑难当的南开园

## 阅读明代（代前言）

正如汤因比主张“需要对人类事务进行全面研究”一样<sup>①</sup>，中国学术诸领域的研究也需要以更为开放的视界，接纳更为广阔、更为丰富多姿的世界。研究者的视角不仅要立足当下，考察现实，也不要指向未来，构想图景，更要向过去时空拓展，关注曾经生活的人，留心曾经发生的事。有历史的人是丰富的人，有历史的国度是成熟的国度，注重历史、不忘历史的时代是厚重、不轻浮的时代。中国人千百年来钟情于“史”，故中国千百年来不失为一个涵蕴丰富、成熟智慧、深厚博雅的伟大国家。相对于历史的永恒、深厚，“现在”是短暂的、肤浅的；相对于历史的实在、已然，未来是虚幻的、不确定的。而“现在”的短暂中之有永恒，肤浅中之存深厚，是因已有历史存在的缘故；未来的虚幻之能化为美好的理想，未然成为确定的现实，亦因有历史之故也。可以说，现在、未来，皆统一于历史（而不是统一于“现在”）——历史是根，历史是本；阅读历史，研究历史，考察历史文化，分析历史现象，则是追“根”究“本”。

“史”的考察，首先需要解决的是视点的择取问题，即站在何处读历史、看历史的问题。虽然无论从何时从何处切入，面对的同样是历史时代的陈迹，需要的同样是沿波讨源，触类旁通；但视点和切入点不同，进入的具体历史情境则迥异，接触的事实，引发的思考，领悟的道理，吸取的智慧，都不尽相同。因此说，可以有千万种途径进入历史的堂奥，但最好的途径必须是经过思索后作出选择的。

---

<sup>①</sup> 《历史研究》第23页。

而要解决研究的视点问题，首先要解决的是研究的立足点的问题。就目前对中国史包括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文学史等研究来说，立足点应该是很清楚的，那就是对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作全面的了解和整理，呈现其精华，再现其辉煌，服务于当今，贡献于世界。从这一立足点出发，最重要的两个视点是当代研究者以及所有当代中国人不能忽视的，这两个视点一是汉唐，二是明清。深入地研究汉唐、明清，其意义不在深入地研究美国、日本和欧洲之下，或者说，在经济上潜心学习美国、日本及欧洲之同时，千万不可对汉唐文明、明清文化不加吸收、借鉴和批判。

汉唐和明清，可以代表我们对我们的历史的两种取向，故其历史意义不可等同。如果前者留下的主要是辉煌的话，后者带给我们的则更多的是思考——汉唐的文明需要再现，明清的悲剧（主要就政治言）则无需重演。所以研究明清，从某种意义上说比研究汉唐更具有实际价值和迫切性。还有一层原因更显而易见，那就是明清与现在相距更近，无论物质文明还是非物质文明都说明，已经逝去的明清时代并非完全成为历史遗迹，而仍然是当今文明构建的重要部分，且不用说故宫和长城那种建筑史上最伟大的杰作对当代中国人的美和人格气质的塑造，也不用说《四库全书》那种超大规模的世界绝无仅有的文献巨典对于中国文化无与伦比的象征意义和研究价值，不用说昆曲、京剧、苏州园林以及平遥、西递、宏村的古居那些贴近人们生活的文化遗产，就是家喻户晓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红楼梦》也是明清时代对于当今以及未来读者的至珍至重的一份非凡馈赠——“四大名著”对于中国人的文化意义和精神价值并不在“四书五经”之下。这些还绝不是明清时代留给我们的所有一切，而所有这些已足以确定我们对于这两个时代引起充分重视的态度，促使我们全方位地加强对明清时期各领域的深入研究。

对于明清又当作分别论。其中，明代是更具有复杂历史性质的时代，明代之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对于明清两代乃至中国社会的近代历程的研究具有根本性意义。这是因为，在政权上，虽然对于汉族来说清代是异族统治的时代，但这个异族统治的时代，严格地说并非由清人而是由明人建立起来的，或者至少可以说是清人藉明人之力而建立起来的，因此可以认为，清朝的政权几乎是明人的“馈赠”——没有明，岂有清？没有明之失之亡，岂有清之得之兴？而明之失之亡，不仅是一种政权的交接，更重要的是标志社会经济形态之大变更，思想文化之大逆转，尤其是民族智识结构和智识指向的大调整。所以，明代之兴代表一种文明之兴，明代之衰代表一种文明之衰。而在这种兴衰演变之中，中国社会的前近代历程也就改变了她的步伐，变动了她的方向。

明代是一个英雄时代，壮大是她的气质。近二百五十艘船组成的官兵超过二万七千人的七下西洋的郑和船队，数千人参纂的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的《永乐大典》，一百多万人历时十多年修建的以紫禁城、皇城、天坛为代表的皇都建筑大群落，历明前中期二百年复修、扩修长达万里的长城，还有由文人自发组织的人数达到数千有时参加活动者竟上万的前所未有的大社团，等等。这些数据无一不见证那是一个书写“大手笔”的历史时期，而它们集中出现在同一个朝代，则是少有的，但又绝不是偶然的。数据的背后透出一个时代的气息——英雄之气息，显示一种时代气质——壮大之气质。

明代是一个浪漫时代，潇洒是她的气质。虽然这种浪漫、潇洒的出现似乎有些姗姗来迟，从其孕育、发展到成为一种基本的社会生活情态和精神面貌，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但至少在明中期以后即显出了明朗的迹象和整体的走向。这种社会格调不仅与专制政治的逐渐松动是同步的，与明代商业经济和城市文化的发展节奏也是同步的，而且与人们生活方式和人生观念的转变也

恰相一致。“凡月之夜，花之晨，雪之夕，游人往来，纷错如织。……倾城阖户，连臂而至。衣冠士女，下迨蔀屋，莫不靓妆丽服，重茵累席，置酒交衢间”<sup>①</sup>，这是明代苏州人的生活；“楼船箫鼓，峨冠盛筵，灯火优傒，声光相乱，……名娃闺秀，携及童娈，笑啼杂之，环坐露台，……”<sup>②</sup>，那是明代杭州人的生活；“公侯戚畹，甲第连云；宗室王孙，翩翩裘马。以及乌衣子弟，湖海宾游，靡不挟弹吹箫，经过赵、李。每开筵宴，则传呼乐籍，罗绮芬芳。行酒纠觞，留髡送客，酒阑棋罢，堕珥遗簪”<sup>③</sup>，那是明代南京人的生活。袁宏道说：“真乐有五，不可不知。目极世间之奇，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谭，一快活也。堂前列鼎，堂后度曲，宾客满席，男女交舄，烛气熏天，珠翠委地，金钱不足，继以田土，二快活也。箧中藏万卷书，书皆珍异。宅畔置一馆，馆中约真正同心友十余人，人中立一识见极高，如司马迁、罗贯中、关汉卿者为主，分曹部署，各成一书，远文唐、宋酸儒之陋，近完一代未竟之篇，三快活也。千金买一舟，舟中置鼓吹一部，妓女数人，游闲数人，泛家浮宅，不知老之将至，四快活也。然人生受用至此，不及十年，家资田地荡尽矣。然后一身狼狈，朝不谋夕，托钵歌妓之院，分餐孤老之盘，往来乡亲，恬不为怪，五快活也。”<sup>④</sup>袁宏道之快活是快活时代的快活，之真乐是真乐时代之真乐。而人之有快活，有真乐，则有人之浪漫之潇洒；时代之有快活，有真乐，则有时代之浪漫之潇洒。以此言之，明人是渴望快活、真乐的人，明代是追求浪漫、潇洒的时代，尽管其快活、真乐、浪漫、潇洒之中不免有奢华、放浪甚至腐朽的东西在。

① 《袁宏道集笺校》卷四《虎丘》，第157页。

② 《陶庵梦忆》卷七《西湖七月半》。

③ 《板桥杂记》上卷《雅游》，第7页。

④ 《袁宏道集笺校》卷五《龚惟长先生》，第205—206页。

明代是一个变革时代，求新是她的气质。明人好动主变，才俊辈出，时代日新，有大气派、大胆识、大作为者不乏其例。明人因物适时，每有忤而不“适”者则必奋力革除之，故具有很强的挑战性和征服力。太祖废除沿袭一千多年的丞相制，虽旨在强化皇权，但内阁制取代丞相制对于中央官僚制度的变革不能不说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政治大手术，明清以降影响深远。成祖力排众议，迁都北京，藉山川形胜，控四夷，制天下，永乐十九年（1421）以后明清五百年之格局一定于斯，而北京作为首都则沿袭至今。臣则如张居正，以“宁有瑕而为玉，毋似玉而为石”的极大勇气和无畏精神投身政治改革，<sup>①</sup>除弊济危，力挽狂澜，在明代以及整个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永不磨灭的“耀眼光辉”<sup>②</sup>。

明代的哲学、思想、文学更是一种主变求新的格局。王阳明之心学便是对朱子之学的反拨与大胆突破，是哲学上的革新之学，其心学运动堪称中国古代哲学史、思想史上最波澜壮阔的一场革命。而王学之分化、狂禅派之勃兴，同样是明人不趋步旧说、死守陈训而敢张扬意气、自立新说的反映。所谓“勇往直前，放手做去。触世纲，犯众怒，其张皇气象，游侠精神，已显然非名教所能羁绊了”的思想品格体现出一种声势张大、不可阻遏的思想运动，<sup>③</sup>除明代而外，似属少有。而在明代，此后复有东林学派和复社集团继起，排击空疏，修正王学，昌明实学，讲究济身济世济天下，明代之哲学、思想和学术又为之一大变，于清代实学开启了先声，奠定了基础。文学上，明代流派云起，坛坫林立，一代有一代之思潮，一地有一地之社团，你且唱罢，我即登场，而新说每出，必出于对旧派观念之反省之批判。茶陵派对台阁体之修正，复古派对茶陵派之动摇，唐宋派于秦汉派之外

① 《张太岳文集》卷七《辛未会试录序》。

② 《剑桥中国明代史》，第 565 页。

③ 《晚明思想史论》，第 53 页。

另辟新途，公安派与复古派之对垒，竟陵派出于公安而别趋一辙，此外虞山派、娄东派、云间派、西泠派等等，无不自立一派主张，自创一番学说。这便构成了一部其他朝代不曾有的意义别样的一部明代文学史——主变求新的文学史，因此完全可以说一部明代文学史是一部具有典范意义的文学观念、文学思潮的变革史。而文学变革之支配力量则来源于变革的时代，以及求新求变的时代气质。

明代虽也是一个专制时代，但她具有一种不可忽视的自我张力。不可讳言，专制是明代社会的重要特质和严重缺憾，但明代社会却不能以“专制”而一言蔽之。论明代若只论其专制，则有历史价值的诸多现象将被掩盖，值得思考的诸多问题终被置于盲区。而所谓专制，其实是封建社会的共同特质，甚至还可以说是国家机器的某种内容。只是其存在形式有时隐约，有时显露，显露时易被人知其有，隐约时则往往让人误其无。事实上，无论存在形式是隐是显，专制作为封建国家的基本性质并无根本改变。中国古代封建国家，一般其初建以“猛”，后则济之以“宽”，“宽”而得其昌隆发展，但也无可避免流于涣散萎弱，最后由涣散萎弱而趋于衰亡。这就像一个生命经历分娩期、哺育期、生长发展期、衰老死亡期而走完他的全部历程。

封建国家之产生则往往像经过分娩的巨痛而诞生一个生命那样必然经历一次极大痛苦的政治分娩。这一点明代与中国古代其他封建时代并无本质区别，不过程度上它与清王朝一样显得更强烈些。但同样是专制的王朝，明代有许多特殊性在：明代社会及明代人与专制政治之关系经过了冲突、适应、突破、反省四个时期，其冲突是惨烈的，其适应是双向的，其突破是大胆的，其反省是深刻的。这使明代专制时代体现了很强的自我张力，包括经济张力、思想文化张力等，而且这种张力愈到明代中后期愈显出极大的活力和生机。虽然相对于日趋老化、萎弱不振的政治机

器，不断壮大、日益活跃的经济因素和思想文化因素，无疑给专制统治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增添了动荡不安的风险，但是却使中国古代因此而产生了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晚明现象”——晚明是明代政权的衰亡期，而绝不是明代经济和明代思想文化的衰亡期，这种不同步性，反映了国家政治生命与经济、思想文化发展的节奏的不一致性，而政治之衰亡却又不能不让仍具有繁盛生命力的经济和思想文化作了它的悲凉的殉葬品。所以，明代之亡与历史上许多王朝之亡并不相同，不是耄耋之躯寿终正寝，而是狂飚骤袭，大厦倾颓，雨打繁花，落红万千……。因此更富于悲剧性，更具有发人深思的历史内涵。

总之，研究中华民族曾经走过的兴衰历程，明代不失为一个重要环节和典型个案。虽说明代离我们远去了，但远去的是作为封建王朝的明代，而作为社会史、思想史、文化史等方面的明代则越来越在现代视野中变得更为凸显和清晰。现代人需要阅读明代，需要研究明代那段不同寻常的历史。

——这本《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续编》就算为阅读明代提供一个小小的侧面吧。

# 目 录

## 城头不变“拙者”旗

——序宗美《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续编》	陈洪	1
阅读明代（代前言）		3
文人结社的文化渊源		1
北郭诗社考辨		
——兼论元末明初三诗人群体		41
明代怡老诗社综论		74
明代杭州西湖的诗社		93
西湖八社考论		106
明代南京文人社集与文学流变		135
复社南京社集及其影响		174
东林、复社人物关系考		221
《谭元春集》复社成员考		258
竟陵派与复社关系初探		277
《复社纪略》校点订误		297
清初甬上遗民结社略考		342
参考书目		353
后记		361

## 文人结社的文化渊源

文人结社兴于宋元时期，盛于明代，至20世纪前期仍为文坛一大景观。结社促进文人交流，增强文学风气，树立风雅传统，催生文学流派，激扬文学思潮，在中国文学史上影响广泛，意义深远。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现象，文人结社在其兴盛之前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它的文化渊源甚至可以上溯到先秦时期。从广阔的视角考察，文人结社关乎我国古代政治、思想、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一些现象、制度和观念，尤为密相关联者如春秋战国时期的养士风气，肇始于春秋的私学以及后人的聚徒授学，汉之太学与唐宋以后的科举，历代的贬谪弃官与致仕养老制度以及几乎贯穿我国古代历史的隐逸现象，儒家的友情观以及节日宴游习俗、名士风流传统等，此数端基本构成了我国古代文人结社的文化渊源。

### 一、养士风气

后世文人结社是由最初的文人集团演变而成的，文人集团的源头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养士风气。《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云<sup>①</sup>：

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

---

<sup>①</sup> 《史记》卷四六，第1530页。

王道衰微、政局动荡的时代，迫使各诸侯势力为了争霸的需要，纷纷网罗各类人才，由此，一时形成礼贤、养士的风气。此尤以战国时为甚，齐之孟尝君、赵之平原君、魏之信陵君、楚之春申君，其门下食客皆达三千余人，《史记·春申君列传》云：“春申君客三千余人，其上客皆蹑珠履以见赵使，赵使大慚。”<sup>①</sup>后世因此有“珠履三千”的说法，这不仅说明门客之多，而且还说明他们受到较好的待遇，有较高的地位。

门客的成分并不单纯，包括当时活跃于社会各界的各类“士”，其中有智谋之士、舌辩之士、侠义之士，也有一些“鸡鸣狗盗”之徒。他们基本上是当时各种政治势力的服务工具，战国四公子的门客皆属此类。不过，士人的这种大规模聚集，在当时的政治、外交舞台中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在我国文化史和学术史上也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一种带有纯学术性质的学派即在这种“养士”的世风中孕育并产生了。

齐宣王的养士，与战国四公子有了很大不同。门客的身份趋于统一，已属所谓“文学游说之士”，邹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等为著名的思想家、学者，他们共聚齐之稷下，其功夫集中于“不治而议论”的学术上，且“各著书言治乱之事”<sup>②</sup>。史载当时聚于稷下的学士达“数百千人”，以至出现“齐学”大盛的局面。胡适称齐学“一面总集合古代民间和智识阶级的思想信仰，一面打开后来二千年中国思想的变局”<sup>③</sup>。如果说孟尝君等人的门客尚属一种驳杂的士集团，那么稷下学士群体则是文士集团之中的学术团体了，这就向文人社团迈进了一步。

汉代诸侯王承袭了战国养士之风，较有代表性的有淮南王刘

---

<sup>①</sup> 《史记》卷七八第1874页。

<sup>②</sup> 《史记》卷七四，《孟子荀卿列传》，第1841页。

<sup>③</sup> 《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第7页。